

● 傅云龙

中国知行学说述评



求实出版社

中国知行学说述评

傅 云 龙

求 实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吉勇夫

封面设计：翟永莲

中国知行学说述评

傅云龙

求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7印张 175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500

ISBN 7-80033-022-2/B·3

定价：1.40元

出版《教研参考》的说明

为了促进党校的教学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我们计划选择一些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著作、译作、论文、资料，作为教研参考用书，陆续出版，供各级党校参考。由于我们缺乏经验，水平有限，在选编工作中，难免会有缺点、错误，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
求实出版社

前 言

我们中华民族有自己优秀的、灿烂的古代文化和哲学传统。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持什么态度，始终是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当前开放、搞活的新的伟大变革时期应该注重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对民族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一切，显然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我们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中确实存在着保守、落后的方面，这就要求必须对它们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所谓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正象对外来文化和哲学一样，对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既应该有所吸收，又应该有所排斥，也就是吸收其精华，排斥其糟粕。而这就需要分门别类的进行深入细致地探讨和研究。这样做，不仅是进行国内外文化、哲学交流的需要，也是实行和促进文化观念改造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同时，更是我们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在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本着上述认识，几年来，我在讲授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逐次感到有三个影响比较大的问题，即人性问题、知行关系问题和古代辩证思想问题，应该进行专题性的比较深入地研究，并着手作了一些探索。这样，在1981年底，我写成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人性问题的研究》一书。并在党校科研办公室和求实出版社的支持下，于1982年年底公开出版发行。

尔后，我又接着进行中国哲学史上关于知行关系问题的研

究，于1983年初写成《中国知行学说述评》一书。该书稿在我所在的哲学教研室和校科研办公室的支持下，曾打印出来，这就有条件使我能广泛地征求校内外专家、学者和同志们的意见。该书打印稿曾分送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石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辛冠洁教授和校内韩树英教授等同志。在百忙中，他们都抽时间审阅了书稿，既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又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对他们的支持、鼓励，我是衷心感谢的。在此基础上，我又对书稿作了认真的修改和充实。

在此书中，我力图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分析知行关系问题的思想武器，力求做到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历史分期与知行问题的发展相统一，即以知行关系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把历史时期、人物（观点）尽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既注意到知行关系问题的一般形态，又注意到它们的特殊表现，例如玄学、佛学的知行观等。在此基础上，指明“知行”是中国哲学思想中一对重要认识范畴。知行关系问题始终是中国哲学史上两条不同认识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探讨了知行范畴的提出、演变，阐明了在不同历史时期，围绕知行关系问题所展开的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及其特点。力图对古代认识思想发展的规律进行科学的分析，同时，也联系到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作了必要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当然是一次尝试，限于水平，效果如何，还有待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作者1986年底于北京西部

目 录

前 言	(1)
一 中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人类思维活 动发展的概况	(1)
(一) 中国原始社会思维活动的发展概况	(2)
(二) 中国奴隶社会初期思维活动的进展	(7)
二 春秋战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知行观点	(11)
(一) 圣人不行而知的知行观点	(13)
(二) 听言观行的知行观点	(16)
(三) 言足以复行者尚的知行观点	(19)
(四) 行有不慊于心, 则馁的知行观点	(22)
(五) 同于大通, 此谓坐忘的知行观点	(24)
(六) 后期墨家唯物主义的知行观	(27)
三 荀况对春秋战国时期关于知行问题的唯物 主义总结	(33)
(一) 行高于知, 知明而行的知行统一观	(35)
(二) 言必责其用, 行必求其功的知行观	(39)
四 王充等唯物主义哲学家对于董仲舒“法天 之行”的批判	(45)
(一) 法天之行的神学唯心主义知行观	(45)
(二) 陆贾、贾谊和《淮南子》的唯物主义 知行观	(50)

(三) 知物由学、学贵能用的唯物主义知行观	(55)
五 欧阳建等坚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唯心主义玄学知行观的驳斥	(63)
(一) 不行而虑可知的玄学知行观	(64)
(二) 所谓“坐忘”的玄学知行观	(68)
(三) 傅玄、杨泉、裴颢唯物主义的知行观	(71)
(四) 言尽意论的知行统一观	(75)
六 反对佛学神不灭、不可知论中范缜对唯物主义知行观的贡献	(78)
(一) 道安、僧肇等的佛教知行观	(79)
(二) 戴逵、何承天的唯物主义知行观点	(84)
(三) 范缜对唯物主义知行观的理论贡献	(86)
七 佛教唯心主义知行观的大泛滥与刘禹锡等的唯物主义知行观	(91)
(一) 四大佛教宗派的宗教知行观	(91)
(二) 王通、韩愈的知行观点	(99)
(三) 行道及物的唯物主义知行观	(101)
(四) 天人交相胜，还相用是唯物主义知行观的运用	(103)
八 张载王安石等基本唯物主义的知行观点	(109)
(一) 知由内外之合的认识思想	(109)
(二) 五事以思为主的知行统一观	(113)
(三) 当观象以求的认识论	(117)
九 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与之对立的叶适陈亮的知行观	(121)
(一) 以知为本，识在所行之先的知行统	

一观	(121)
(二) 格物致知与知先行后的学说	(126)
(三) 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的知行观点	(132)
(四) 当理而后动审势而后为的知行统一观	(135)
十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与王廷相等对其尖锐的批判	(138)
(一) 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知行观	(138)
(二) 讨诸理而尤贵达于事的知行统一观	(144)
(三) 以实事征实理的知行观点	(148)
(四) 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的知行观点	(149)
十一 王夫之朴素辩证的知行观和颜元戴震对其的继承与发挥	(152)
(一) 形神物三相遇而知觉乃发的反映论	(154)
(二) 行先知后, 行可兼知的知行统一观	(158)
(三) 习而行之的唯物主义知行观	(162)
(四) 血气心知的唯物主义知行观	(166)
十二 近代哲学史上唯物主义知行观的一般进展	(170)
(一) 及之而后知的知行观点	(172)
(二) 必验之事物事而皆然的知行观点	(174)
(三) 学当以格致为实际的知行观	(177)
(四) 唯物主义唯理论的知行观点	(179)
十三 孙中山的朴素辩证的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	(183)
(一) 进化论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183)
(二) 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观	(186)
十四 中国哲学史上知行学说概要	(955)

(一) 知行关系问题之 提出的分期及 其形 态	(195)
(二) 中国知行学说的特点	(200)
十五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中国的知行学说	(203)

一 中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人类思维活动发展的概况

人类原始思维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是一项重大而复杂的科研课题。但是，根据考古和各个方面的综合研究，人类原始思维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也不是无规律可循的。正是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曾经指出：“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①又说：“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②在这里，很明显，马克思揭示了人类早期认识思想产生和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这就是说，由于当时生产水平的低下，思维能力的不发达，不能正确理解和说明自己同周围世界的关系，而只能寄托于感觉和幻想。这样一来，在人们的眼中自然界的各种现象无一不笼罩着神秘的色彩。因此，原始人最初的世界观只能采取有神论的形式，而他们最早的意识形态也只能通过宗教和神话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知道，人类的始祖是古猿。与当时的各种动物相比，古猿的神经系统较为发达，具有颇强的适应能力和极为灵敏的反映，有着最高的动物智慧。同时，由于古猿的较为复杂的生活行为和群居生活，又使他们形成了比较高级的动物语言，以便协调彼此间的行为，传递信息和表达喜怒哀乐等感情。因此，古猿发达的头脑，开始出现的思维能力，为人类思维的产生，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历史前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6页。

从古猿到人类，并不是生物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劳动过程中逐步完成这一根本性的转变的。恩格斯在谈到劳动和语言对人类意识形成的作用时，曾指出：“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①这就是说，归根结底是劳动使古猿变成了人，是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语言又使古猿的动物意识上升为人类思维。而人类思维一经形成，便与古猿的动物意识有了原则的不同。古猿的动物意识，基本上属于一种高级的动物本能，它只是为了更好地适应于环境。人类思维则是一种有明确自我意识的自主的精神活动，它不仅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环境，而且要认识、改变或改造环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科学论断，完全适用于我国原始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情况。

（一）中国原始社会思维活动的发展概况

根据考古发掘的资料证实，我国历史上的古人类大约产生于旧石器时代的初期，其中有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等；中期的马坝人、长阳人和丁村人等；晚期的则有柳江人、资阳人、山顶洞人等等。这时期的古人类，已经学会使用天然之火，并且能够打制尖状、砍砸、刮削等简单石器和从事采集、狩猎等活动。同时，又根据对他们脑皮层上语言区部位的考察，说明他们已经具有了初级的语言。事实上也证明，他们在行为的目的性方面已有所自觉。譬如，事前可以预料使用各种不同的石器产生的不同效果，能够根据已往的经验，打制各种不同形状的石器，并且知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2页。

保存火种等等。这些都说明，他们已经开始运用头脑来思考问题。当然，这些思考作用还是比较被动的，其主要的目的还只是为了谋求生存，逃避灾害，而且也为了当时直接感知的事物和实际的生存活动、行为所制约。也就是说，他们还缺乏一定的概括力和想象力，还不能够类推间接和较远较复杂的事物。因此，这时期的古人类的思维活动能力，大体上是相似于现代儿童心理学上所谓的感觉动作思维阶段，和幼儿刚刚学会思维的水平相差不多。

但是，到了我国古人类晚期的山顶洞人，则已经产生了或出现了最早的原始宗教观念。当时，正是从原始人群走向母系氏族社会的时代。他们已经开始知道和学会了人工生火，“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①而且，从当时的人死亡之后的随葬品的情况看，例如，在死者的身旁不仅放有燧石、石器、石珠、穿孔兽牙等物品，还撒有褐红色铁矿粉粒，表示给死者以温暖，祈望死者能够再生。这些足以说明，他们已经初步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关于这种丧葬有制的情况，从认识论的意义上看，说明人们已经开始思考人死之后的去向的问题。正如恩格斯所分析的，“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②同样的道理，山顶洞人的原始的“灵魂不死”的观念，也主要是由于对睡眠、作梦、生病、死亡等生理现象的不理解，以及对死者的怀念之情而引起的。然而，就山顶洞人这种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220页。

生死问题的原始的朴素的说法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观念，也是一种最原始的形神观。恩格斯曾明确地指出：“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象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①由此可见，在上述这种最原始的宗教观念之中，确实已经蕴涵了哲学基本问题的最早表现形态，即提出了肉体和精神的关系问题。

中国历史发展到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即仰韶文化时代，“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自然宗教崇拜活动，已经十分盛行。所谓的“万物有灵”论是一种最原始的自然观。这是因为，社会发展到母系氏族社会，实际生活的状况使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自然界力量的可怕，从而产生了对自然界的恐惧心理和依赖感。但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人们又有想驾驭自然力量的热切愿望，则产生了在幻想中征服这种力量的神话。人们从自己切身的感受，认为自然物也同人一样，具有思想、意志和感情，即各有其灵魂存在。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还把这种对自然界的看法当做一种真理，用以解释和说明自然界的运动与变化。这样一来，在万物有灵观念的基础上，便形成了对自然界的多神崇拜。

同时，还由于氏族社会本身的发展所决定，人们又开始提出寻求本氏族起源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一重要社会问题的提出，就使得原始宗教观念的内容有所变化，即由单只是对自然界的多神崇拜，又产生了所谓的动物崇拜。氏族起源的问题本来是属于社会历史范畴的问题。但是，由于当时的人们还分不清楚什么是社会历史问题，什么是自然界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从人和动物的联系方面，去寻找答案。所以说，这种动物崇拜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实质，还是把动物当成人的神灵。因此，它仍然是属于一种自然崇拜。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地发展，即把动物崇拜与人们对氏族祖先的追寻结合起来，则又产生了所谓的图腾崇拜。图腾崇拜就是用某种具体的动物来解释和说明本氏族的起源问题。例如，当时不同的氏族就曾分别把龙、凤、虎、豹、熊、蛇等等动物作为各自氏族的标记。而这种图腾也就成了各氏族的徽号和保护神，并因而受到各自氏族的敬仰和崇拜。因此，从人类认识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图腾崇拜的产生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方面，它说明了当时人类思维的发展还处于幼稚的阶段。由于人们还分不清楚人与动物二者之间的界线，则把低于人的动物当作智慧高于人的祖先来加以崇拜。第二个方面，这种情况也表现了人类思维能力的提高，即开始提出了氏族起源这一重大社会历史问题。并且，也表明人们已经初步意识到或者猜测到人和动物之间的联系的问题。

就上述而言，由于原始的自然观、灵魂崇拜和关于氏族即人类起源问题的提出，与旧石器时代的人们相比，人类的思维活动尽管还是具有感性形象性的特点，然而，他们这时已经能够透过眼前的事物和行为，有所联想，并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概括，基本上达到了学前儿童的思维水平。因此，原始宗教观的产生到图腾崇拜的出现本身，恰恰是标志了人类思维发展的巨大进步。

我国历史由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之后，在人类思维发展方面又有了新的突破。譬如，这一时期的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父系氏族社会，在生产上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锄耕农业和家畜饲养业，手工业也已经从农业中分离了出来，还出现了红铜冶金业和养蚕缫丝业。同时，又由于社会产品有了某些剩余，而开始发生了贫富之间的分化，产生了私有制。男子成为了生产的主要担当者，氏族则按照男系来确定血统。这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变化，必然给人类思维的发展以深刻的影响。

例如，当时的人们在他们所能够观察到的范围，已经提出并开始思考了整个宇宙发生、起源的问题。其具体的表现，就是他们提出了象以“盘古开辟天地”为代表的一系列神话传说。而这些传说无疑是一种通过神话形式表现出来的原始的宇宙发生的观点。

与此同时，在关于氏族即人类起源的问题上，则又开始由图腾崇拜向祖先崇拜的过渡。人们逐渐地从对动物的崇拜转移到对男性英雄人物的崇拜。例如，在图腾崇拜的后期，就出现了以男性生殖器为图腾的崇拜。在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里发现的陶祖和石祖，就是男性生殖器的造像，象征着生殖繁衍之神。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关于英雄祖先的神话，这就是认为当时的各个氏族和部落集团，都分别产生自一个想象中的或者传说中的神话式的男性祖先。譬如，有关所谓的神农氏、伏羲氏、少皞、蚩尤、颛顼、契和黄帝等等事迹的传说，就都是属于这类神话。这些神话的产生说明，人类的思维发展已经开始试图用社会本身的活动，来解释和说明社会历史问题。即在他们看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少数才智超群、贡献巨大的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创造的。这种观点当然是一种原始的唯心历史观，或者说是一种唯心史观的雏形。

总括上述，可见，中国原始人的思维活动是经历了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的。在社会生产劳动基础上产生的原始的宗教观念和神话传说，表现了原始人，即人类的幼年时期对自然和社会的幼稚的认识。在这一历史时期，人类思维发展最突出的特点是通过直接感受到的事物，即具体的感性形象思维去把握世界，并试图用以解释和说明自然的和社会的问题。但是，必须看到，在我国原始人的思维活动中，既然自觉或不自觉地提出了肉体和精神的关系这一最基本的问题，又从自然界的整体上提出了原始的宇宙发生论，以及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接触到氏族起源也即是人类起源的问题，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具备了唯心史观的雏形。那末，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原始人的幼稚的认识活动，无疑是构成了文明时代哲学思维的胚胎，在人类认识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是一个必须的历史阶段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事实上也是如此。在我国奴隶制出现和产生之后，与其前一历史时期相比，人们的思维活动能力，的确又有了进一步地提高和发展。

（二）中国奴隶社会初期思维活动的进展

我国的夏、商、周三代，就其总体而言，是属于我国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时期。在这一社会历史时期，在原有宗教观念的基础上，以祖宗神配享天神的宗教信仰是夏、商、周的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当然，如果把夏、商、周三代予以相互比较，其共同的宗教信仰和世界观，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和不断完善、系统的过程。

我们知道，在氏族社会末期，已经开始形成了地域性的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的形成标志着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而夏王朝正是在这种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奴隶制的国家。根据《墨子·兼爱（下）》等篇引用的《禹誓》的内容^①来看，说明夏王朝是直接继承了部落联盟的天神崇拜这种宗教信仰，并且把它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工具的。这也就是说，天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实际上就是当时为奴隶主阶级统治服务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我们又根据《尚书·汤誓》的内容^②来看，足以说明商王朝的宗教世界观也不过是夏王朝的

① 《禹誓》上说，禹在进攻三苗前的誓辞云，“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唯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封）诸群（君），以征介苗。”

《墨子·明鬼（下）》也引《禹誓》说，禹在征伐有扈氏时，亦称“天用剿绝其命”，而他则是“共行天之罚也。”

② 《尚书·汤誓》是商汤伐夏桀的誓辞。辞云，“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